

伯多祿和高美士名聞遐邇 的澳門土生漢學家^{*}

何思靈^{**}

就政治和外交的藝術而言，澳門是藏有無盡資料的寶庫，是一個值得研究和分析的課題，當時葡萄牙人要在澳門停留就要遵守中國朝廷所規定的對外關係的嚴厲規則。由於這種情況，葡萄牙人要在澳門安頓，就必須要有非常巧妙的外交手段不可。

其時，澳門的行政工作連繫於果亞，有時因遠程遙控和利益衝突而產生一些難題，雖然如此，但兩地因使用同一種語言為溝通帶來不少方便。而澳門與天朝帝國的聯繫就複雜得多了，如果沒有懂雙語的人作橋樑，根本就不可能溝通。

在葡萄牙行政當局和當地社群的內部關係上，由於有人懂雙語，所以困難並不大。當時的中國人受中國官員所管轄，他們與葡萄牙當局在政治行政上的關係幾乎是不存在的。

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唯一的葡萄牙行政當局政治整合了中國居民，而當時的文化表現，尤其是語言就出現了二元性¹。

由於形勢使然，必須要設立懂雙語的公務員，亦即是翻譯員了。這些翻譯員，為了行政效率和方便施政，必須要懂得管理者的文化和天朝的文化，藉此確保把外交的詞匯和訊息正確無誤地翻譯出來。因此，由兩種截然不同的施政理念可能衍生的麻煩便消弭於無形。

做翻譯員要經過嚴格和多方面的培訓，對同時期共存的兩種社群的基層文化要有廣泛的認識，他們在多方面都要具有翻譯的才能，換句話說，翻譯員如果能超越兩種專業職能的狹窄目標的話，它便會成為一個漢學家。

今日，我們要向在當時能達到這境界的兩位人士致意，他們就是伯多祿和高美士。

* 於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共行政大樓的伯多祿廳暨高美士圖書館開幕禮上發表的演辭。

** 歷史學士和研究員、澳門總督顧問

1. 關於這個問題，參閱文章《中葡關係結構中的中文學校》，刊於《文化雜誌》，第十八期（第二組），一 / 三月號，一九九四年，澳門文化司署。

伯多祿是誰

要把一個最出色的大地之子的一生濃縮在一篇短文內，對我來說，並非一件容易的事。

伯多祿於1842年出生，十四歲開始在聖若瑟修院又名聖若瑟學校讀書。當時，一個青年人要在澳門受教育是絕不容易的，因為當時的澳門在驅逐耶穌會士的國令下所受的創傷中仍未復原過來，這件事波及到所有的學校教師，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耶穌會士。

1862年，耶穌會士返回聖若瑟學校，恢復教育澳門的青年²。

伯多祿是在聖若瑟學校的耶穌會士教導下的一名最出色的學生。

雖然他是學生，但他已被取錄為華務代理所的學生翻譯員。在他的公職生涯中，擔當的職務繁多。在這裏有關他的紀錄中，他是華務代理所的第一個傳譯員，是聖若瑟修院、商業學校、商業學院和利宵學校的教師，是中國貿易行的臨時代理人，是1885年設立的華務專理局的領導。

在公務生涯結束時，伯多祿說：我們所擔任的一切公職，是要經過考試的，藉此公開考核我們的才能資格。在這方面，我們是能符眾望的³。

有關漢學的研究方面，可以肯定說伯多祿是眾多究研博大中國文化的傑出學者之一⁴，同時他又寫了多本教授漢語的書籍。

這些書籍如下（要注意其著作對教育的貢獻）：

- 葡文及中文的知識課程，為開始學習中文者之用；
- 漢語實用語法；
- 澳門葡文小學男校用的漢語初階；
- 澳門葡文小學學生用的北京及廣州話常用句子及會話匯編；
- 漢語讀寫手冊第一冊及第二冊；

2. 一八六二年六月十五日的《Echo do Povo》這樣說：“一八六二年在澳門土生歷史年鑑中將作為我們祖國的一段幸福時光永遠令人記起。我們有幸在今年參加了兩所學校的開幕禮（新澳門土生學校，於一八六二年一月五日開幕，聖若瑟學校，於一八六二年六月八日開幕），澳門無疑進入一新階段，係我國完全遺忘這生活必需品多年後‘澳門土生青年的教育復興階段’。昨天我們在聖若瑟學校的禮堂聚首，家長們將部分重要的父權交與尊敬的神父，他們尚不為人熟悉，會上清楚說明澳門需要一所招收全日制學生的學校，而這所學校剛好成立了；與此同時，會上亦藉此感激多位知名人士，他們在近年來為推動本地青年教育出錢出力。”摘自《十九世紀澳門傑出土生集》，文德泉蒙席，澳門，官印局，一九四二年。

3. 同上著作，文德泉蒙席，第二九三頁。

4. 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教育歷史中漢學研究之總覽》，載於《澳門政府雜誌——行政》，第三十八期，一九九七年，行政暨公職司。

——基礎概念及進階課程；

——澳門葡文學校適用的廣州話指南；

——及《聖諭廣訓》的譯本，這是一本巨著，是真正的儒家教育手冊，由清朝的開國君皇順治編撰，並由他的兒子康熙和孫兒雍正繼續增訂，這本書是用於教育人民的。透過這譯本，我們明白到通過復興儒家思想去維持國家統一的皇室策略。

1887年，他以傳譯秘書的身份陪同澳門前總督羅沙前往北京，而後者是簽署當年中葡條約的全權公使，這條約賦予澳門一個新的政治身份。在關於社會貢獻方面，伯多祿是仁慈堂的領導人，他設立了孤兒院，他又是振興學會的創辦人，澳門市政廳的副主席及主席，曾是《澳門人報》、《Echo Macaense》和《Hong Kong Daily Press》的記者，在鄰埠香港出版的葡文周報《Echo do Povo》的編輯及國民教育監督委員會和海外省委員會成員。

伯多祿於1912年去世，在他的墓碑上有十分公正的碑文如下：

他為澳門貢獻良多，其一生所為對澳門均是有利的，所以當受讚揚⁵。

5. 同上著作，文德泉蒙席，第三五六頁，摘自澳門教區教會報告，第十年，第一一一至一一二號，九/十月，一九一二年，第六七頁至六九頁：“伯多祿先生，大地傑出之子，於十月十二日清早逝世，享年七十一歲。

他是澳門土生中較凸出的人物，無可否應在五十年代的社會生涯中，他為出生地的發展而努力。他絕頂聰明，熱愛學習，有很強的工作能力，奮力為這殖民地謀幸福，以真正同胞的心為這地方作出貢獻，伯多祿留下了一個難以填補的空缺。

他為澳門貢獻良多，其一生所為對澳門均是有利的，所以當受讚揚。

在教育和公益事務上，很多是經市政廳而為的，他多次當市政廳的領導，在省行政上和解決有關殖民地名聲的嚴峻問題上，一切都為了公共利益代表著澳門土生的功績。毋庸置疑澳門失去了它最出色的兒子，他對這殖民地所作的事很多，他的離開將是我們重大的損失。

在聖若瑟修道院學習期間他已是一位出色的學生，完成學業後投身社會工作成為政府翻譯員學生。

他醉心於學習中國語言，在翻譯專業中表現特出，有理由相信他是首位的葡人漢學家。後來被委任為華務專理局的領導，並以新基礎重組這個機關。

一八八七年，以傳譯秘書身份陪同全權公使羅沙（Conde de Sousa Rosa）先生前往北京。他在商談一八八七年條約時表現出積極和聰穎，這個條約確保了澳門的獨立（當時，他是條約的葡文官方翻譯），受到國人的感謝和友善對待。

教育事業是他生命後期值得我們特別關心的。澳門振興學會便是由他一手創立的，這個會出了不少學生，今天在整個遠東他們都佔有很好的地位。他還創辦商業學院和利宵學校。編寫了各色教科書，當中包括《澳門土生青年中文使用手冊》。仁慈堂在澳門的開設，並因他而茁壯成長。當他出任這個慈善機構的領導時（他多次擔任此職位），成立了孤兒院，收養和教育了很多貧窮兒童，如果沒有澳門土生慈善院的照顧，他們還生活在痛苦中。同時組織和規範該機構轄下的所有慈善服務，使仁慈堂在澳門作為慈善機構可以做很多有意義的事。

伯多祿係國民教育委員會成員和多年來參與省委會工作。亦以記者身份在多份定期刊物如《Echo do Povo》、《Echo Macaense》和《澳門人報》中發表文章。

參與多個處理殖民地整體利益的委員會的工作，在各個委員會工作中，他的真知卓見和高標準令他懂得解決複雜的問題。

近代的漢學家

高美士 (Luís Gonzaga Gomes) 可以講是華務專理局所屬學校培養出來的最後一位偉大漢學家。

他生於1907年，曾就讀於澳門利宵，在完成中學課程後進入華務專理局工作，並成為該機構的一等傳譯員。他走上漢語研究的路途，在他一生中都可以尋找到痕跡。他以熱誠和毅力對中國文化進行研究，這些都遠遠超過作為華務專理局工作人員所要求的。

高美士並不僅是翻譯員和傳譯員，他是漢學家，是中國人思想的解碼者和揭示者，更是對澳門歷史進程有很清楚認識且能提供這些重要資料的學者，可以透過其不同方面且數量眾多的著作得以看到。

在眾多作品中，要提及的是，在中國文化方面有：《澳門的中國傳說》、《中國的領養制度》、《中國的寓言故事》、《中國人的言行舉止》、《中國傳統節日》、《中國藝術》等；

在語言方面有：《葡語粵語詞匯》、《粵語葡語詞匯》、《漢語基礎理論》等；

在歷史方面有：《舊澳門逸事》、《澳門手寫本著作目錄》、《澳門歷史事件》、《土生葡人書目》以及關於澳門市政的一些重要作品；

在翻譯方面有：《三字經》、《孝經》、《四書》、《澳門記略》、Álvaro Semedo 所著的《與中華大帝國的關係》以及 Gabriel de Magalhães 所著的《新的中國關係》。

高美士搜集在當時若不懂中文而難以明白的資料，藉著這些資料，葡萄牙的漢學家便可以走進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裡。

高美士不但是知識分子，亦是一位被認為對其出生地有大量貢獻的人。他在一生當中曾擔任過很多工作，曾當過記者和《復興雜誌》等刊物的合著人、官立小學的教師和校長、利宵學校教師、市政廳副主席、澳門國立圖書館館長、《賈梅士學會學刊》社長、賈梅士博物館館長等，同時亦是著名的音樂人，曾領導“音樂文化界”樂隊和澳門電台。

在1976年去世後，他的一位朋友對他的生平曾作出了高度的評價：高美士為人特立獨行，他以自己本人的努力而得到成功，他代表了澳門文化史的一個階段。而這些都不是像今天所採用的宣傳工具和讚美的方式而取得，所以他的作品必能長存⁶。

沒有人像他那樣認識殖民地最近五十年的歷史，當然，我們知道這是由於他經常參與省的行政和政治事務有關。

在他繁忙的一生中，伯多祿從未忘記他的信仰。一直是個忠實的教徒，而他辭世前所做的一切均符合一個真正教徒的所為。

我們深深惋惜這個傑出公民的離去，他一生為善和具有高尚情操，給後代和同胞們遺下尊敬的模範，作為家長、祖國傑出政治家的模範。在此謹向其家人表示哀悼。”

6. Túlio Tomás: 《朋友和欣賞者證言》，載於《高美士影集》，澳門文化司署出版，一九八七年。

本人對此毫無疑問。時間藉著歷史所篩選的自然進程，以凸顯澳門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今天我們在此追憶這位具有漢學家、智者、外交家、政治家和公民風範的人物，他在構築澳門的特徵方面作出貢獻。而我們只要將這些回憶世代相傳下去，就算盡了我們的責任了。

